

访谈戴锦华（下）：非黑即白证明我们面对现实的无能

2015-11-22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戴锦华

编者按：

如何去清算“20 世纪大失败的历史”？如何面对现实问题并且重拾贴身肉搏的勇气和能力？戴锦华讲到，“不是黑和白之间的选择，在黑和白之间有无限丰富的灰色的光谱，那个才是可能性之所在。”“在胜利者的历史当中去重新展示失败者的逻辑，而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书写失败者的必然失败。”

关于知识分子，左拉的时代已经确定，当你挺身走上社会舞台以弱对强，声张社会正义的时候，你就是知识分子，而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该是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份。

犬儒、标签化、身份政治可能带来道德自恋，需要反思和警惕。以下是戴锦华接受搜狐文化专访文字稿下半部分全文：



戴锦华

嘉宾介绍：戴锦华，1959 年生于北京，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出版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与孟悦合著），《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雾中风景》，《昨日之岛》等。

在胜利者的历史当中去重新展示失败者的逻辑

搜狐文化：您刚才也提到首先对 20 世纪历史需要审判、清算，但好像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一步。

戴锦华：审判已经完成了。今年暑假我去俄罗斯开会，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没有 20 世纪的历史。这确实让我非常惊讶，本来我很好奇今天的俄罗斯人怎么讲述苏联的历史，结果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历史到 19 世纪为止，20 世纪蒸发了。这本身表明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巨大的困境——他们显然是没有办法讲述。今天俄罗斯人会把俄罗斯重新勾勒成一个东正教和沙皇双头鹰下的一个古老国家。但是从伊万雷帝到彼得大帝，他们都有一个巨大的争霸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实现了这些梦想，为什么反而这段辉煌的历史从俄罗斯的国家历史当中消失了？**因为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两大帝国之一的历史逻辑，有异于我们曾经有过的和今天有的历史逻辑，所以没办法把它纳入到历史当中。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正是审判，因为 20 世纪已经被抹除了。**

但是我所说的清算是在遗产继承人的意义上，每一个 21 世纪人都是 20 世纪的遗产继承人，遗产继承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债务清理，不清理债务就不能启动遗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还有责任继续作为 20 世纪的债务清算者，但我们清算债务是为了启动 20 世纪的遗产。

搜狐文化：如何去清算 20 世纪的历史？

戴锦华：这是我们的幸运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当有些人没我们这么幸运，或者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你被封闭在一个不变的社会结构的时候，你就丧失了用完全不同的视点、标准、位置去看待历史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经历了如此多的不同时期，每个时期的价值、生活方式如此不同，使我们有机会知道强大的历史之手的书写怎么样把每个人形塑而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责任成为历史债务的清理者和启动者。

“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对我来说我拒绝加入到审判失败者的行列，不是因为我认同失败者，而是因为审判失败者太便宜了，太廉价了，太无聊了，而且会有太多人蜂拥而至审判失败者。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在胜利者的历史当中去重新展示失败者的逻辑，而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书写失败者的必然失败。这一点也是我认为我们留给未来的一点小小的东西，让人们知道曾经有个不同的逻辑，不同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未必不是未来的可能性。

搜狐文化：中国在如何清算 20 世纪的历史？

戴锦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在文化艺术书写当中，就试图把我们的历史直接接续到 30 年代，减去中间的所有的段落，曾经我们也把中间的段落描述成一个非现代的、黑暗的、混沌的、暴力的年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大概这就是和

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大概近几十年来主流文化或者官方文化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努力就是如何回收那段历史。

回收那段历史经常被认为好像要重回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的努力，其实在我看来完全不是。重新回收那段历史的努力刚好在于要消化掉那段历史当中的异质性，用一种同质性的逻辑去使那段历史重新获得有效性和合法性。今天我们的历史再次成为连续的历史，在电视剧当中，50-70年代甚至包括文革都可以再次进入到电视剧的情境之中，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的逻辑当中解释了那段历史，抹除了那段历史当中的所携带的冷战中的异质性文化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和俄罗斯很不同的方式，显然俄罗斯还没有建立一种消化掉苏维埃联邦的异质性的那种能量，以致俄罗斯的那段历史仍然就被屏蔽掉。

二元思维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无能 挑战想象力的时代

搜狐文化：二元评价体系影响太深，左右，好坏等等都是评价人的最直接方式。如何来打破集体意识中的二元思维？

戴锦华：我觉得你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形式基本是今天知识界一个主流认识的样态。我觉得有一点偏狭了，因为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本身是欧洲哲学传统。但是更具体地说我曾经也认为这种黑与白，善与恶，是与非，争议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在文革之中，对此我曾经非常厌恶和拒绝。直到后来我发现首先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独有的，它是冷战格局下的冷战思维创造强化的一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非善即恶的意识形态。当时我们都非常熟悉毛泽东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路线斗争问题上没有调合的余地。”后来我非常惊讶地读到雷蒙·阿隆，他是冷战时代所谓右翼自由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说“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时代，凡是不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灰色地带”，我最早是在英文中读到这句话的，两句话连句法都很像，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冷战时两大阵营对峙下的冷战思维。

冷战一方面是两大阵营的对抗，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而另外一方面冷战的冲突和对抗其实更多表现在每一个阵营内部，比如在美国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极端的思想检查和思想控制。在苏联发生清党这样最惨烈的事情，再比如文革发生的很多惨剧。冷战的残酷更多地发生在某一个阵营内部，阵营内部不断地甄别敌人。

在今天世界面对的后冷战世界现实，高度全球化的现实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高度被整一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但另一方面今天世界整体性的出现一个原子化、碎片化的格局。作为一个做文化的人要真实地面对处理这种格局，恐怕这种善恶是非式的二元对立是绝对不够的。



雷蒙阿隆

比如说敌友的关系是很难划定的，因为每一次界定，你都得确定站在哪个位置上，你依据什么？面对什么？对什么发言？今天是一个挑战思想能力、挑战想象力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哪怕仅仅是在学术领域当中，我也在呼唤想象力。因为所有这种被网络所强化的，动辄就站队划线的模式，甚至有时候问题与站队划线毫无关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悲哀，我倒不觉得它仅仅是历史的债务，它同时是我们面对现实时候的无能。

搜狐文化：如何在破碎化中保持想象力？

戴锦华：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感受力，打开感受力，保持好奇，不试图以所谓理性的名义放逐情感。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个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在形态结构。你怕什么？你爱什么？你恨什么？本身的向往是什么？这些都是被形构出来的。对我来说就是保持不试图去放逐情感性，在面对和处理自己情感的时候不让任何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理性逻辑先在地进行决定。

另外一方面就是高度自觉地保持真诚，保持真诚首先是真诚地面对自己，就是无论曾经形成什么样的立场，都要面对自己的体验、感受和情感，然后试图去向自己解释自己的情感、体验、感受和情感。

学科化是对 60 年代学术的反动 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实是什么

搜狐文化：在当前学术的风气中，如何来抵抗集体惯性？

戴锦华：大学内部的问题一方面跟刚才所说的电影状态其实非常相近。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西方世界用几百年所完成的从实体经济到货币化和货币的资本化这样一个过程。西方世界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完

成金融经济巨大泡沫化的过程，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结果就造成了“不差钱”，“金钱涌流”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学当中的“君子固穷”，“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指认还是存在的，但是突然之间太多的钱涌出，并不是说它唤起了大家心目中的贪婪，而是变成了需要消耗这些钱，就变成了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本来我们要用这些钱去达成一个学术目的，但是最后这些钱高于我们要达成的学术目的，把这些钱花掉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更急迫的和更现实的事情，因此造成整个学术生产状态的混乱。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专业化。我认为学科化、专业化本身就是对 60 年代学术的反动，60 年代在大学内部创造的就是对学科壁垒的跨越。而现在是学科分工的细腻化、专业化。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好是一个一切都要打开的一个时期，而今天面对如此强大的学院体制和数据化管理系统，个人的反抗真的是很无力。

搜狐文化：是想象力被束缚了么？

戴锦华：想象力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面对现实问题并且去贴身肉搏的勇气和能力。很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实是什么。

搜狐文化：国内学界很容易陷入对国外某位学者的推崇甚至崇拜，像福山，史景迁，齐泽克等。除了国外学者本身的能力，国内学界对于国外学者的相对陌生化，某种崇洋心理的遗留，都是造成某个领域对于国外某人的特别推崇。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国内学术圈很难真正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讨论，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不思进取。

戴锦华：二战以后整个西方学术发展都是被法国的理论生产所左右，法国输出理论，美国中转包装，然后行销全世界。今天法国的大师大部分都已经仙逝了，法国理论已经基本上处于不再能够继续生产的状态当中。那么实际上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全世界的学者要真实地面对问题和回答问题。平等对话的现实结构性条件已经存在了，这个时候每个人就要自问，你要不要做这件事？你能够以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件事？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已经成熟了。

媚外心理的整体存在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刚好列举的这三个人，我觉得不是媚外能够解释的。因为福山非常特殊，《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之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德里达还在世的时候专门写了《马克思的幽灵》这门书来回应他，他先说这本书（《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不值得回应，可是它的影响如此之大又必须回应。福山刚好是在冷战终结、后冷战莅临的关节时刻，很多人都处在失语状态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做了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描述，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史景迁也是个案，因为 90 年代之后中国开始学科化，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但同时我们在面对现实和历史时感到无力，完全不知如何切入？这个时

候史景迁提供了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将历史进行微观化、编年化。他给处于在瓶颈和思想困顿当中的中国学术生产提供了一个大出口，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知名度。

而齐泽克根本是学术界的流行文化，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我说齐泽克早期的作品，特别是他用塞尔维亚语写的作品当中是有真知灼见的。但是后来齐泽克每年一本甚至两本的著作都可以当做闲书来读还是非常有趣的，中有趣之中也会有所收获，但是不必正襟危坐地来读齐泽克。

与此同时相对晚进来的西方思想大师根本就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所以我觉得媚外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心理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具体到学术界来说，最大问题不是媚外，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越出学术内部的种种流行和历史的偶然所造成的风潮，真实地更系统性地把握冷战、后冷战，即面对后冷战之后的西方学术思想，并且尝试和他们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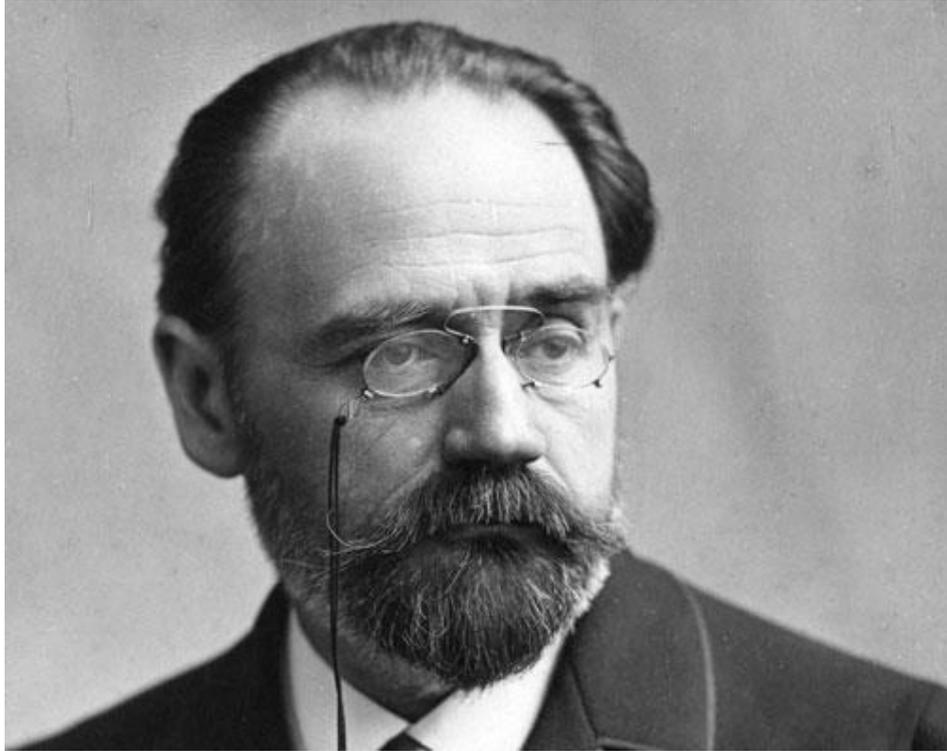
当你不伸张正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

搜狐文化：当前语境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语义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衍生出了更多的贬义，加上受众心理的变化，知识分子当前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发声，如何沉默？

戴锦华：对我来说知识分子是个历史概念、功能概念。作为历史概念它有几个源头，一个源头就是控诉，“雷德福斯案件”中的左拉（法国作家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写下《我控诉》），从19世纪末期开始包括十二月党人在内反抗的民粹政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按照法国知识分子史学家的观点，控诉这个概念二战结束以后就死亡了。我比较赞同一位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家的说法，当生物学革命把最早的转基因产品从克隆生命推到转基因产品再推向市场的时候，已经诏告了另外一个转基因的出现：大公司与大学之间的转基因。每一个现代高科技尖端产品都是大学实验室和大公司资本及其品牌的结合，本身就是个转基因产品。在西方现代历史当中建造的“大学作为一个象牙塔，大学当中的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骂知识分子或者呼唤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想象还有“控诉”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存在，因为社会生态已经被变了，所以“控诉”概念上的知识分子早就死了。

从功能意义上我一直强调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身份，读多少书都不能代表你是知识分子，只能代表你是学者 scholar。因为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是个功能概念，左拉的时代已经确定，当你挺身走上社会舞台以弱对强，声张社会正义的时候，你就是知识分子，而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该是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份。所以在这个功能意义上，可以讨论为什么今天没有这样的人出来履行功能，而不要去说知识分子怎样了，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态度。但是总

的说来，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社会学者们仍然应该自觉地成为社会正义、社会良知、社会公正的一种声音。应该天然更紧密地连接着弱势群体，而不是天然地联系着强势集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这是崇高，我也不认为这是理想，我认为这是本分，我们有待倡导、有待生长、有待集结。



左拉

搜狐文化：当前往往会出现滔滔不绝或者沉默不语，两者都不是在合适的时候。

戴锦华：大家都在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但是啥都没说，啥都不说，说的完全是陈词滥调，这就是滔滔不绝的失语。“沉默与发声”本身是 19 世纪的一个命题。因为沉默与发声的抉择其实要求两个前提条件，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关于社会正义和非正义判断的共识，当社会对这个问题有共识的时候，我们看到邪恶和非正义开始欺凌正义和弱小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作出选择，在这个时候沉默是可耻的。

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体的“象征体系的坍塌”，你心目中的正义可能刚好是我心目中的非正义。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你认为在挺身抗暴，在沉默处发声，而在另外一边看来在权利的意义你是在助纣为虐，在描述现实的意义上你做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指认。这是一个完全非 19 世纪式的生态，我大概不会用悲壮或悲情去想象沉默和发声。现在的问题在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发声，大声疾呼非常勇敢，但是在说给谁听？有人在倾听吗？通过什么途径到达所抗议的对象？而现在我们还是在有强势暴力机构和弱势言说者之间的社会共

识的情况下的悲情想象，这种悲情想象在今天中国其实非常有效，但是这和今天整个中国面对的社会现实以及面临的问题有巨大的错位。

这和我为什么用“想象力”有些语言不详的词有关系，因为一方面不要满足于曾经有过的知识结构、阐释路径、历史经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走出一己的历史经验、历史结构、语词系统、生产方式，去面对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事实？可能单纯有勇气已经不够，因为如果有勇气而没有能够正确认识现实的话，那真的可能刚好变成对自己初衷的背叛。

“大众”要么是一个结构性的虚构，要么就是一个巨大的沉默所在

搜狐文化：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戴锦华：如果我能够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成大师了。在我的一生当中大概这两三年来我是最没有把握的，我以前总是有一个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整体把握。但是这两三年来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比如说当我们还在讨论实物经济货币化的时候，中国已经加入全球金融资本进程中。这个变化是中国创造出来的奇迹呢，还是蕴藏了太多的危机？我真的没办法判断。

我就尝试去从我可能有的各种各样的角度和路径去逼近它，不断否决比如自己曾经形成的判断，或者补充自己的判断。这些年我研究电影比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整体的判断，所以就能够在整体宏观意义上去把握一些问题，但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电影作为中国奇迹的一部分，作为工业、商业系统，同时它又试图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系统，所以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同时我也继续跨出去关注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成果，如果可能的话我就自己参与调查。当然不是用他们的学科方法去处理，我更多希望获得这种身体经验、生命经验，来补充我自己的相对来说抽象的思考，慢慢地去接近。

搜狐文化：抵抗流行、抵抗大众还容易陷入另一种逻辑，就是为创新而创新，会不会有这种担忧？

戴锦华：首先我不觉得我是在抵抗大众，因为所谓大众要么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虚构，要么就是一个巨大的沉默所在。我一直在说我拒绝悲情，对我来说悲情就是去历数敌手的不义，但是敌手的不义并不天然赋予你正义，你的正义要你自己去建立、去实践、去表达。

在冷战结构的时候很难创造第三个位置、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可能性。而任何的二元结构一定是暴力结构，事实上都压抑了第三元、第四元。我所取的位置是把第三元、第四元先引出来对抗二元结构，当第三个因素存在的时候，二项结构就被瓦解掉了。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认为不可能有单纯的二项结构。所以我的工作去发现被二元结构所压抑的元素、事实、力量。但是我也不以消滅二元结构作

为我的目的，当我发现了第三元、第四元存在的时候，某一种历史的或者现实的真实结构就会浮现。

这样就会有一些可能性浮现出来。我也拒绝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择其善者而从之”，一个人文工作者不能这么做。除非你真的面临某个历史时刻，或者某个非常真实的情景，而且正义和非正义是真切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要作出抉择。但是作为思想工作，我认为根本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你做这样选择的本身就是对于既定的强势结构的加盟，刚好相反应该去打破这个结构显现可能性。不是黑和白之间的选择，在黑和白之间有无限丰富的灰色的光谱，那个才是可能性之所在。

标签化是一种社会暴力 今天是主义分外无力的一个时代

搜狐文化：怎么看您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别人给您贴的一些标签，包括女性主义者、现代主义者等等。

戴锦华：标签这个词本身已经说明了它是分类的明细化，它也一定是简单化的。把他人标签化本身就缺乏真诚和善意，比如说我是个女性主义者，没问题我真的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同时我还有太多的身份和现实都不是主义能够概括的。所以当人们把你标签成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就把你标签为比如说张牙舞爪的、仇恨男性的、处处挑衅的，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者；还有一种女性主义就是性解放的、随意的。所以我觉得标签化本身有时候是一种社会暴力。标签化有时候是思想懒汉，因为标签化的定型化想象太容易了。什么主义者就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主义分外无力的一个时代。

而身份本身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英文中所讲的 Identity，同一性，这本身已经包含了有机，要建立同一性是要建立一种有机体，所以身份原本应该成为对标签化的对抗。但是今天的身份经常是比如职业、标签，刚好把标签变成一种分裂的、扁平化的、单一的描述，和身份这个概念本身有冲突。

所以我很难回答我的身份。我记得 2003 年去日本做系列讲座，本来我的讲座只是讲中国电影，但是我发现我被很多的标签钉死了，比如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我当时就对每一个标签作了定义，每一个标签在偏见定型化想象当中意味着什么？对我意味着什么？最后我先发了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结果在日本学者当中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好多女性学者讲她们第一次觉得女性主义被打开了，原来女性主义还可以处理女人之外的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对于身份的回答。但是我觉得身份在今天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成了今天世界上唯一有动员力的形态。但是这个身份政治本身极端的粗暴，在身份下面有多少东西被压掉？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身份政治恐怕只是一种强大的民粹动员方式，今天反思和警惕身份政治也是一件特别紧迫的事情。

搜狐文化：如果是标签没了，想象力是不是就可以打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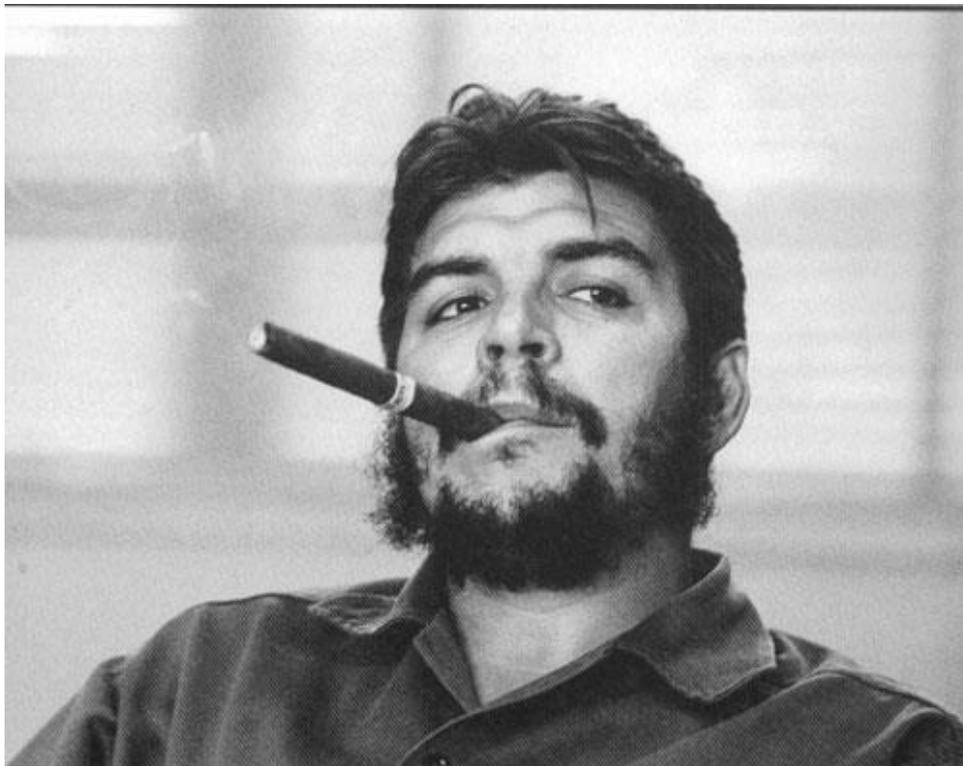
戴锦华：不能够没有标签，标签属于分类学，分类学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但标签并不是标签化。如果标签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那并不是我的全部，所以我是觉得标签化才是问题。

搜狐文化：被标签化盯死了？

戴锦华：标签化主要是封闭。如果我们意识到 Identity 本身是同一性，而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是同一性的碎裂，我们就可以明白标签化和身份政治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同一性在被撕裂，社会的整体象征秩序在破碎。

在这种情况下，把身份作为一种标签化的手段，那么就会离现实越来越远，离真实面对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有时候身份政治和标签化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但有的时候也是社会行动无力的表现。从文化层面上看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驯顺，而是犬儒。犬儒就是把问题简单化，通过标签化、身份政治、悲情政治来获取一种巨大的道德自恋。

在道德正义感中就会和最初想去面对的社会问题，以及想去参与的社会现实完全无关了，就会生活在一个假想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会说拒绝悲情，是因为我不想用我的敌手来定义我自己，我必须自己定义我自己。可能在很多时候我分享了我的敌手的观点、立场和事实，但是我认为拒绝悲情也就是拒绝简单化、拒绝自我封闭、拒绝抱团取暖、拒绝道德自恋，就是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切·格瓦拉

搜狐文化：您怎么来看待死亡？

戴锦华：对个体生命来说，死亡就是终结。我们对死后世界的认识是人类全部知行行为的起点，但是我们半步都没有推进。我们对死亡完全无知，所以人类是唯一的一种动物，它预知死亡，但是始终不能接受死亡。我过了 50 岁以后已经把死亡作为我的命题，我希望我能够做的好一点，不至于落入那个越临近死亡越贪生怕死的套子当中去。

搜狐文化：谢谢戴老师，耽误您这么久。

戴锦华：谢谢你们。